

晚清瑞安留学生独领风骚

■俞 光

瑞安留学生在晚清温州留学热中独领风骚，他们学成归国后，在推动辛亥革命，以及温州、浙江，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，而且他们身上所体现敢为人先、追求真理、追求科学、报效祖国的精神，沉淀为瑞安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激励后人披荆斩棘、不断前进。

中日甲午战争中，我国战败而遭受割让台湾、辽东，赔款2亿两白银的奇耻大辱。消息传来，全国群情激愤，救亡图存成为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。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四月，清政府开始派遣首批13名学生留学日本，而后逐年增多，至1906年多达8000名。此后清廷颁布留学规定，要求凡通日语，并具有中等以上学历者方可留学。接着又通电停派速成留学生，于是留学生人数锐减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留学生几乎全部回国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十月，永嘉县王鸿年（**鲁瑯**）由使馆官费派遣留日，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，开温州出国留学风气之先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三月，瑞安县林调元（林摄）由南洋官费派遣留日，入成城学校、后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，成为瑞安出国留学第一人。据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刊《浙江潮》、清国留学生会馆历次《报告》，及其他一些资料，从1898年至1911年，温州出国留学学生共138人，其中瑞安籍54人，乐清籍34人，平阳籍27人，永嘉籍23人。瑞安籍留学生人数占温州留学生总数五分之二，成为其时温州留学生队伍中的主力。而在宣统年间（1909—1911），清廷举办的几次归国留学生廷试中，瑞安林大闾、项骧、林大同、黄曾铭高中进士，项骧在殿试中又金榜题名，得一等第一名，俗称洋进士、洋状元，一时在温、瑞传为佳话。

晚清瑞安留学生中较为著名者，除笔者在《辛亥革命前夕瑞安反帝反清斗争》（见本报2011年10月26日11版）中提及的林调元、黄曾铭、林大闾、林大同、沈靖、许桑外，还有许璇、洪彦远、项骧、李墨西、许壬、金嵘轩、许微等人。

许璇（1876—1934），字叔玠，瑞安渔篁街人。我国近代农业科学的奠基人和农业科学教育的一代宗师。1904年6月公派留学日本，主攻农业经济学。他从东京引进我国久已失传的无核蜜柑——温州无核蜜柑在瑞安试种。1912年毕业归国，先后在北京大学农科、北京农业大学和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，累计长达20年，并4次出任院长、校长。其间还曾一度出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。从1925年至1934年逝世，他连续被选为中华农学会干事长、委员长和理事长。著有《农业经济学》、《中国粮食问题》两书，及农业合作、农业关税、农业发展、租佃制度、农地价格、农业金融、蚕丝经济等学术论文数十篇。他逝世后，北平大学为他举行公祭和校葬，中华农学会除出专刊纪念外，还设立“许叔玠奖学金”，以激励后人。

洪彦远（1879—1958），字岷初，瑞安林宅巷人。1904年4月东渡日本，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，苦读7年，毕业回国。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参加归国留学生廷试，授师范科举人。民国初，他相继在河北保定师范大学、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数学教席，后调浙江省教育厅任秘书长。未久，他又任浙江第十中学（今温州中学）校长。在职期间，他鼎力革新，知人善任，还兼授数学，苏步青尤得其栽培。1918年初，他调任教育部视学。苏步青成为我国著名数学家后，曾赋诗道：“岷老怜余如幼子”。

项骧（1880—1944），字渭臣，号微尘，瑞安县城小东门人。1901年

入南洋公学特班，1904年游学日本。次年留学美国，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，获硕士学位，1909年毕业归国。次年，高中洋状元后，授翰林院修撰。1912年至1925年，他先后在民国政府财政部任首席参事，三任次长，兼理部务，并任盐务署全国盐务稽核总办，对我国近代财政制度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，被民国政府授以一等大绶勋章。后因北洋政府腐败，他辞去一切职务，回归故里。抗战期间，他登台演说，怒斥日寇，捐金义卖，支援前线。1941年4月，瑞城沦陷时，敌伪威逼他出任维持会，他临难不屈，严词拒绝，以致脑溢血导致瘫痪。1944年秋，瑞城第三次沦陷时，他绝食而亡。

李墨西（1880—1915），名祖林，以字行，瑞安县城打绳巷人。1904年8月留日，入弘文学院。次年下半年学成归国，大胆引进日本食品罐头制造技术，与弟慕林共同创办浙江最早的食品罐头企业——太久保罐头厂。牛肉、枇杷罐头相继获得1910年南洋劝业会、1915年巴拿马贸易赛会金牌奖，驰名中外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创办浙南最早的石印企业——印刷所。他们还是浙江最早的海归企业家。

许壬（1884—1930），字养颐，许璇之弟。我国司法界老前辈和近代著名的民法专家。1904年赴日，先入弘文学院，后就读政法大学。1906年任浙江官立政法大学教务长兼民法教习，1910年创立浙江政法学堂兼民法教习，同时兼审判研究所民法教习。1912年任浙江第一地方法院院长兼法庭庭长，并被选为浙江律师公会会长、都督府参议员、省宪议会议员。著有《民法财产债权担保》、《民法讲义》、《民法总则》等书，为我国近代民法的制定奠定基础。

金嵘轩（1887—1967），原名希同，字桐熙，学名嵘轩，瑞安林垵人。1906年东渡日本求学，1911年冬，因病回乡休养。翌年秋复学，后进日本高等师范学校。1921年春学成归国，先后任浙江第十中学教师、师范部主任、校长等职。1927年调浙江省教育厅，相继任督学、社教科长。其间，他卖掉祖传良田200亩，得款八千余银元，为温州中学偿还债务，至今传为美谈。1939年秋创办永嘉私立济时中学，1945年8月至1955年底，先后任瑞安中学、温州中学校长。1956年1月，任温州市副市长，先后兼任温州市体委主任、温州师范校长，当选为省人大代表、温州市政协常委、民盟省委副主委、温州市委主委等职。

许微（1888—1969），字治同，许壬之弟。我国近代著名的冶金、兵工及热处理专家。1904年6月赴日留学，入东京帝国大学军工科，毕业后归国。民国时期，任南京军工专科学校校长，兼任兵工署少将参议。抗战时期曾在武汉和重庆兵工厂任总工程师，为抗战作出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被聘为东北工学院热处理教授、辽宁省政协委员，为培养新中国技术人才而努力。文化大革命遭迫害致死。

瑞安留学生在晚清温州留学热中独领风骚，得益于其时瑞安的维新思想深入人心，新式教育起步较早，留学国外，报效祖国，已为瑞安的有识之士所普遍接受。特别是光绪三十年春，瑞安普通学堂因经费支绌停办，在校学生面临着学制衔接的问题。因当时国内高等教育刚刚起步，于是，孙治让在县城话桑楼召集家长座谈会，鼓励学生出国留学。因而项骧、洪彦亮、洪彦远、薛楷、沈靖、许璇、许微、许微、余纲、李墨西、李翰西、王翺卿、林绍章、唐介、陈恺、许藩、朱绍年、林大禹、孙衡等人都在该年或公费、或自费赴日留学，其人数占从1898年至1911年瑞安出国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。

瑞安先贤故事会 ⑰

杨景衡鼎力助郑和

■马邦城

明永乐三年(1405)七月十一日上午，碧空澄澈，万里无云。苏州刘家港(今江苏太仓浏河)埠头上，人山人海，鼓乐喧天。紧靠埠头的长江江面上，一字儿排列着两百余艘崭新的海船。远远望去，像是一座座高大城墙，篷帆高悬，旌旗飘扬，在阳光照耀下，显得分外美丽壮观。

随着一声号炮响起，海船像两百条矫健的游龙，依次有序地向东方缓缓驶去。行进在最前面的那艘“宝船”上，高竖着一杆迎风招展的大旗，上面露出斗大的“郑”字。原来，郑和统率的下西洋船队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，在这一天正式扬帆起航了。船队将沿长江东下，准备出海后，驶至福建闽江口的五虎门和长乐县的太平港驻泊，等候东北风来临，再伺机南下西洋。

郑和所率的船队分别由宝船、马船、粮船、座船和战船等大小不一的海船组成，俨然一支庞大的联合舰队。其中有六十二艘宝船，船长四十四丈八尺(149米)，宽十八丈(60米)，船上共有八条桅杆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。船队由二万七千八百人组成，还配备了分别掌管军事、财务、气象、航行、商务、翻译等工作的各方面专业人才，其中光医官、医士，就多达一百八十多名。

如此规模庞大的船队，要在福建逗留数月时间，待到冬季刮东北风时再扬帆出海，这可把时任福建左参政，掌管全省财政和民政事务的杨景衡大人给忙坏了。别的先不说，届时光提供这两万多名航海人员吃喝，及日常所需就够他受的。

其实早在两年前，杨景衡刚就任福建左参政时，就与下西洋这件旷古未有的大事扯上关系。当时，郑和正在南京那边赶造海船，筹建船队，急需用人。福建靠海，是全国造船和航运发达的省份，杨景衡曾多次奉诏，从各州、县为郑和物色挑选造船的工匠和有航海经验的水手。如今，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，郑和选择福建闽江口作为船队停泊基地，无形之中，又将杨景衡推上船队“后勤部长”的位置。

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，郑和的船队配备分工相当的科学精细：运载分送各国的名贵礼品和通商物资的为宝船；支撑船员后勤供应的为粮船；装运马匹、便于船员登陆后使用的为马船；坐船和战船都是供将士使用的军用船只，以保卫船队安全及应对突发战事。除此外，还有专门贮藏淡水的水船。为这么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提供后勤保障，可以想见，杨景衡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！更何况船队运载赠送各国的礼品，用于交易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铜器、铁器、漆器，及手工艺品等货物，还有船员自需的粮食、用品、物资等，有很大部分要在福建就地取材。这一切也都由他这个左参政亲自统筹调排。

船队抵达福建后那段时间，杨景衡既当联络员，又当调度员，隔三差五往长乐那边跑，经常要与钦差正使郑和、副使王景弘等舟师要员碰头，商议采购物资、补充给养等诸多事宜。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、层出不穷，他往返奔波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太平港是船队驻泊的基地，位于长乐县西面，背负首石、六平山麓，左有金鸡山屹立，右有五马、六鳌环卫，前有巍峨雄伟浮峰山作屏障，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天然避风良港。当时，郑和的水师辕门就设在长乐城南三峰山上，那有一座七层高的圣寿塔，杨景衡常陪同郑和、王景弘等人一起登塔俯瞰太平港内的船队。看到上百艘海船，桅杆林立、气势恢宏的壮观场面，杨景衡不由地一阵激动，能够为船队远航西洋、扬威异域而尽力，他感到无比自豪，自己为此所受的苦与累，也就不在话下了。

至永乐十年(1412)的七年间，杨景衡共为郑和三次下西洋，提供财力和物力支持。每一次都将诸事操办得井井有条，不仅保证船队的供给，而且不劳民伤财。据史载，当时远航所需开支耗费十分惊人，“往劳彼输之费，动以亿万计”，而杨景衡却安排有序、调度得法，“公从容筹划，适中肯事，集而民不废业营”。

然而，就在杨景衡为郑和的第四次远航作准备时，却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。因担心财力不支，他对朝廷在长乐南山扩建供船队出海祭祀之用的“天妃行宫”，提出反对异议，而遭贬官。



马知力 画

杨景衡辞官归里后，过上难得清闲的日子。然而就在第二年，即永乐十二年(1414)，蒙古漠西瓦剌首领马哈木入侵中原，明成祖决定御驾亲征。当时朝廷急需一位为军队调征粮草物资、精干得力的人选，结果，户部尚书夏元吉和礼部尚书方宾，都不约而同地向皇上推荐杨景衡，诏令他总督全军粮饷。其时，杨景衡的长子杨煜刚亡故，他正处在丧子的悲痛之中，但皇命难违，他不得不以国事为重，即刻启程赴京。为确保明军能有充足的军需给养，他不辞辛劳，亲往江、浙、苏、皖、湘等省筹粮募饷，及时解送前线，使朱棣顺利击败瓦剌进攻，取得反击战的胜利。

班师回京后，朱棣接到福建吏民的联名上书，要求皇上恩准，让杨公重回福建主政。明成祖特地召见杨景衡，对他说：“福建民庶望汝如饥渴之于饮食，希爱卿赴任后，不要辜负众乡亲的厚望。”

永乐十四年(1416年)，杨景衡复任福建左参政。第二年，正赶上郑和第五次下西洋，他又一如既往，鼎力协助郑和，操劳奔忙开了。宣德三年(1428年)，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诏命下达。杨景衡为此曾多次亲临长乐，实地巡视检查物资筹备情况。他夜宿天妃行宫时，与住持杨一初道人促膝长谈，商议在官前立碑记志朝廷下西洋之壮举，后来得以实施。这就是举世闻名的《天妃灵应之记》，俗称“郑和碑”。碑文详细记录了郑和前六次下西洋的时间、到达地，及与各国贸易交流的史实。此碑几经磨难，沉沦荒山野林之中，至1930年才被农民挖土时发现，一直保存至今。由于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于成化年间销毁殆尽，此碑文填补了那段历史的空白，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杨景衡在福建施政近三十年，历经六次下西洋，直到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供给方案落后后，朝廷才恩准他告老还乡，当时他已届古稀之年。临行之际，杨一初道人将一艘曾随郑和下过西洋的船模，赠送给杨景衡，以表敬意。回乡后，杨景衡将船模供奉于瑞安海门(南门)天后宫内。船模入宫之时，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仪式，一路鞭炮迎送，香案连接，地方为之轰动。

不久，杨一初道长又将《天妃灵应之记》碑刻拓墨，派人专程送给杨景衡。阅毕碑文，杨景衡心潮起伏，欣然提笔赋诗一首。诗云：“门外春风摇柳条，来鸿唤忆赠航艚。天临阙水奎光近，云涌南山圣位高。清庙新碑宜作颂，丹书旧迹有留毫。安涛镇浪天妃在，盼见舟师凯雁毛。”

杨景衡在瑞城东北隅造了一幢“归田别墅”（在今公园路），作为自己养老居所，时人称之谓“杨衙里”。生前他一直怀念与郑和船队交往的那段非凡经历，每年都定期到“妈祖庙”祭祀天妃娘娘，并将天后宫的龙舟尊名为“金龙”，此俗一直沿习至今。

六百年前，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，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，成为世界的永久记忆。而任劳任怨、全力协助郑和船队，促其成就举世伟业的瑞安乡贤杨景衡，也必将成为家乡人民永久的记忆。

人物名片

Rui an

杨景衡(1359—1444)，名南，以字行，号曲江外史，人称“杨大参”，瑞安汀湾(今云周上埠)人。明洪武二十六年(1393)中副榜进士。永乐元年(1403)起任福建左参政达二十多年，主管全省财政、民政等。任职期间，为保障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的后勤供应，起了至关重要作用。